

鈴木大拙訪華與北京佛教舊影

邢東風

愛媛大學法文學部人文學科教授

中文摘要

1934年5-6月間，鈴木大拙為考察中國佛教的現狀而訪華。本文根據鈴木當時留下的照片、事後寫成的訪華印象記以及其他相關史料，以他在北京的訪問活動為線索，就他當初經歷過的場所、人物、史實進行考察，從而揭示中國近代佛教及中日佛教學術交流史的某些側面。第一部分交代本文的意圖；第二部分考察鈴木與胡適的交往經過，以及二人在禪宗研究上的學術互動；第三部分考察鈴木在北京的禪宗文獻調查以及他與中國學者交流的具體經過；第四部分敘述鈴木在北京看到的佛教實況；第五部分對鈴木在北京訪問的寺院和僧人進行考證；第六部分揭示鈴木此次訪問的意義。

關鍵詞：鈴木大拙、胡適、北京、近代佛教、敦煌寫本

D. T. Suzuki's Visit to China and the Past Memory of Buddhism in Beijing

XING, Dongf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Faculty of Law and Letters, Ehime University

Abstract

May and June of 1934, was the period when D. T. Suzuki visited China to study the climate of Chinese Buddhism of the time. Based on his photographs, articles written after the trip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such as records of his interviewing activities in Beijing, by examining the places he visited, people whom he had met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aspects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Buddhist scholarship.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will state the aim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section is on the contact between Suzuki and Hu Shih where exchanges of their Chan Studies will be looked at. The third section will examine his research on Chan Buddhist materials in Beijing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Chinese scholars. The fourth section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as observed by him in Beijing. The fifth section i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onasteries and monastics which Suzuki met during his visit. The sixth section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Suzuki's visit.

Keywords: D. T. Suzuki, Hu Shih, Beijing, Modern Buddhism, Dunhuang manuscript

一、引言

鈴木大拙（1870-1966）是二十世紀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學者，素以向西方世界宣傳介紹東方的思想文化、特別是佛教禪學而著稱。然而鈴木的經歷及其精神世界並非僅限於歐美，實際上他與中國的關係也非常深厚。僅就其經歷而言，他生前曾兩次到中國訪問。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時在1934年5月6日至6月19日，鈴木大拙和中村戒仙、高島眉山、藤井靜宣、齋藤貞一等五人專程來到中國¹，歷時約一個半月，目的是考察當時的中國佛教現狀。他們先後到上海、杭州、寧波、蘇州、鎮江、南京、北京、瀋陽等地，走訪了許多著名的佛寺、道觀、大學、圖書館及名勝古跡，會見了當時中國佛教界、學術界以及政界的許多重要人物。在鈴木的經歷中，這是一次直接、廣泛地瞭解當時中國佛教現狀的機會，它不僅是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事項，而且涉及到中國近代佛教史的許多方面，通過對他這次中國佛教之旅的考察，可以瞭解許多被忽略或被遺忘的近代佛教史實。

關於這次訪問，筆者幾年前曾經作過追蹤考察。在考察過程中發現，鈴木當初經歷過的許多與中國近代佛教相關的事項，諸如他訪問過的某些場所、他接觸過的某些人物、他看到的某些事件等等，如今早已人事皆非，相關的舊跡或已消失，或改作他用，或頹廢破爛，相關的人物和事件，或被遺忘殆盡，或者記憶殘缺。本文根據鈴木當時留下的照片、事後寫成的訪華印象記（日文《支那佛教印象記》和英文《中國佛

※ 收稿日期 2014.10.30，通過審稿日期 2015.4.14。

¹ 中村戒仙，日本臨濟宗大德寺派僧人。高島眉山，日本臨濟宗圓覺寺派僧人。藤井靜宣，又名藤井草宣，日本淨土真宗大谷派僧人，曾在中國留學和工作，是一位中國通。齋藤貞一，鈴木友人齋藤利助之子，此次訪華期間擔任隨行秘書。

教的印象》²) 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以他在北京的訪問活動為線索，就他當初經歷過的場所、人物、史實進行考察，從而揭示中國近代佛教的某些側面。

鈴木大拙訪問北平（今北京）的時間是 1934 年 6 月 6-14 日。其間先後訪問了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東方文化事業部、北平圖書館、白雲觀、雍和宮、天壇、頤和園、某育幼院、景山、中山公園、觀音寺、龍泉寺等，會見了錢稻孫、蔣夢麟、胡適、祁大鵬、橋川時雄、覺先等許多人物。這裡只談其中與佛教及佛教研究有關的部分。

二、鈴木與胡適的相會

在近現代的禪宗研究史上，鈴木大拙與胡適（1891-1962）的交流是著名的佳話，而他們在北京的交流，就發生在這次訪問期間。當時鈴木與胡適會見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北京大學偶然相遇，第二次是 6 月 9 日鈴木拜訪胡適，第三次是在東方文化事業部的聚會。照片資料中有一張鈴木與胡適的合影，根據照片題記，該照攝於 6 月 9 日。胡適當天的日記也提到鈴木來訪，但沒有說明會見的地點是在何處。從這張照片來看，二人立於一座建築物外面的臺階之上，臺階上有精美的漢白玉石欄杆，這樣的建築很可能是當年北大校內的某座校舍，因此可以推測，鈴木是到北京大學訪問了胡適。

² 《中國佛教的印象》之英文原題為“*Impressions of Chinese Buddhism*”，有酒井懋日文譯本（《中国仏教の印象》）和邢東風中文譯本，刊載於《松ヶ丘文庫研究年報》22，2008 年 3 月。



■ 鈴木大拙與胡適

此次是他們的第二次會見。就在半年之前，二人曾在日本橫濱見面，當時談到了禪宗文獻的話題，此次在北京的會見，依然是上次交流的繼續。關於這次訪問，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鈴木大拙（貞太郎）來訪，贈我：

敦煌本《神會語錄》

敦煌本《壇經》

興聖寺《壇經》

佛光國師年表塔銘 以上各三部

Essays in Zen Buddhism(Third Series)〔《禪宗論文集》（第三種）〕

敦煌本《神會語錄》的一本流入日本，由石井光雄影印；此次又由鈴木校點排印。此本大體同於我校印的神會長卷，但首幅比我的少，末幅比我的多。其所多者甚可供研究。

此卷尾有題記：

唐貞元八年歲在未，沙門寶珍共判官趙看琳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令勘造。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

唐癸巳年十月廿三日比丘記。

貞元八年為壬申（792），未年當為七年（791），八字誤也。其後之第一癸巳為元和八年（813），第二癸巳為咸通十四年（873）。此卷為八世紀末葉之本，可以推知我的長卷比這本當稍早，近於神會生時了。

鈴木此本曾用「胡適本」校對，功力甚好，但仍有誤字可校。我當重校一本。³

這裡提到的敦煌本《神會語錄》，全稱《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這個敦煌寫本原為石井光雄個人收藏，1932年，石井將其影印發行，俗稱「石井本」，以後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又以石井本為底本加以校訂，校訂時參考了胡適的《荷澤神會和尚遺集》，從而成為繼胡適之後第二個敦煌寫本神會語錄的校勘本。1926年，胡適在巴黎發現了敦煌寫本神會語錄，後來加以校勘整理，收在《荷澤神會和尚遺集》一書，1930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經他校勘的這個本子，通常稱為「胡適本」。胡適本與石井本的內容大體相同，但是文字互有出入，特別是在結尾部分有明顯的差異。鈴木在對石井本作了校勘之後，還為這個寫本作了一篇〈解說〉，其中的要點，一是對兩個本子加以比較，指出石井本是胡適本的另一種抄本，兩本相較，石井本在卷首部分闕文較多，卷中部分兩本大體一致，文字互有出入，而胡適本的闕字和錯亂相對較多；二是說明神會的歷史地位以及敦煌本《神會語錄》的價值，認為通過敦煌本可以重新認識神會在禪宗史上的重要性；三是對石井本的卷末題記作了考證⁴。鈴木的校訂參考了胡適本，因而此次將自己的研究成

³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95-396。

⁴ 參見鈴木大拙，《敦煌出土神會禪師語錄解說及目次》，東京：森江書店，1934年，頁1-15。

果送給胡適。胡適認為鈴木的校訂「功力甚好」，但是仍有誤字，所以希望進行重校，不過這項工作直到他的晚年才得以完成，在他去世以後，以手稿本形式收在《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一書（1982年胡適紀念館出版）。

另外，胡適對石井本《神會語錄》結尾部分的內容更為關注，這個部分恰恰是比胡適本多出的部分，胡適認為「甚可供研究」。關於這一判斷的理由，胡適沒有說明，但是可以通過他的相關研究看出。實際上，這個部分的內容是對《金剛經》的強調，以及禪宗傳法世系的敘述，而禪宗的傳法世系正是胡適的禪宗史研究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一。胡適很早就注意到禪宗的傳法世系是後人逐漸編造出來的，它涉及到法統之爭，認為通過考察禪宗傳法世系的形成，可以看出禪宗的真實歷史，因此他對於石井本的這個部分也就特別敏感。

在對神會的歷史地位和敦煌寫本《神會語錄》的評價上，鈴木和胡適的看法基本一致，他根據敦煌寫本資料，對神會思想的特點作了更為恰當的敘述，對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也作了新的估價。在此之前，胡適曾在〈荷澤大師神會傳〉裡指出神會思想的特點是尊崇《金剛經》，認為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⁵。但是胡適的觀點並未引起積極的回應，這種情況未免讓他感到落寞和失望。可是沒有想到，遠在東瀛日本，卻有鈴木的觀點與他遙相呼應。根據鈴木在1948年的回憶，他們在北京時也談到了這個話題：

記得在北平和胡氏談到了《神會遺集》。胡氏說：「我雖然出版了《神會遺集》，可是在自己國家的學者中沒有人對這本書作出

⁵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82年，頁90。

回應，倒是在鄰國卻有像您這樣的人，真是難能可貴。」胡氏好像對本國的學者沒有世界眼光心懷不滿，這種情況在哪個國家都一樣，都是鼠目寸光。要之，不管是在中國或日本，苟志於學者，就不能放棄作一個世界人的想法，不能沒有把自己的言論傳向全世界、不喚起反響絕不甘休的決心。⁶

實際上，當初鈴木頗為欣賞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對胡適「用極為細密的批評眼光整理材料」及其「敏銳的才能和科學的見地」甚感欽佩⁷。鈴木在校訂石井本時參考了胡適的成果，而且對神會的評價也受到胡適的影響，只是他的提法比胡適更為謹慎而平緩，不像胡適那樣誇張和激烈。不管怎麼說，二人的觀點基本同調，他們是最早對敦煌寫本神會資料進行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對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進行重新評價的學者。至於對石井本年代的考證，二人的結論也是一致的。

胡適提到的敦煌本《壇經》，就是《大正藏》第48冊中收錄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這部《壇經》原來也是敦煌寫本，收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後由矢吹慶輝收入《鳴沙餘韻》，鈴木與公田連太郎又對此本加以校訂整理，題名《敦煌出土六祖壇經》。

興聖寺本《壇經》原藏日本京都興聖寺，是十七世紀初日本根據北宋版《大藏經》中的《六祖壇經》復刻而成的本子。內容分為上下二卷、十一門，在現存的《壇經》古本中，與敦煌寫本《壇經》比較接近，對於考察《壇經》的歷史演變具有重要價值。此本先於1933年由安宅彌

⁶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33，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頁240-241。

⁷ 參見上書，頁240。

吉影印出版，同年 10 月，胡適訪美歸國，途經橫濱，會見鈴木大拙，鈴木向胡適介紹了這個本子，胡適回國後不久，便收到鈴木寄贈的影印本，其中還有鈴木大拙撰寫的〈解說〉⁸。關於《壇經》古本的問題，也是胡適所關注的重點之一，他曾於 1930 年撰寫〈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一文，在收到鈴木寄贈的興聖寺《壇經》影印本之後，很快便著手研究，於 1934 年 4 月 5 日寫成〈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一文⁹，其中對鈴木的〈解說〉作了進一步的考察和訂正。同月，經鈴木大拙和公田連太郎校訂的《興聖寺本六祖壇經》與《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敦煌出土六祖壇經》等一併由森江書店出版，而胡適的〈壇經考之二〉一文也作為附錄收在《興聖寺本六祖壇經》之內。由此事實不難推測，胡適在寫成該文之後馬上寄到日本，至當月 15 日，森江書店已將胡適的文章附在書內刊行。其交流速度之快，就是在今天也未必能輕易做到。

以上三個本子都是對當時新發現的慧能及神會資料的校訂，於 1934 年 4 月由日本森江書店出版。鈴木把這些剛剛出版的資料帶到中國，先在上海送給魯迅，後在北京送給胡適，而胡適得到的這份禮物當中，也包含有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佛光國師可能是指無學祖元（1226-1286）。祖元是中國南宋和日本鎌倉時代的禪僧，無準師範禪師法嗣，原在浙江一帶修行傳法，南宋滅亡以後東渡日本，先後住持鎌倉建長寺和圓覺寺，深得北條時宗和鎌倉武士的敬重，後被尊為日本臨濟宗佛光派創始人。鈴木送給胡適的

⁸ 參見胡適著，柳田聖山編，〈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胡適禪學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年，頁 302。

⁹ 胡適當天的日記：「寫成北宋本〈壇經考〉。」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 6，頁 360。

《佛光國師年表塔銘》，大概是關於無學祖元的資料。因筆者尚未見到這個資料，故不知是否為鈴木整理。

在近代史上，鈴木與胡適是禪宗史研究的兩位泰斗，他們都很關注對方的研究，並曾多次直接會面，通過交流互動，促進了各自的研究。總的來說，在禪宗史文獻這一研究領域，胡適起步較早，而且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他的成果和觀點都給鈴木提供了有益的啟發，而鈴木則充分利用日本的資料優勢，發現和整理了更多的禪宗史文獻，並將這些資料及時提供給胡適，從而使胡適得以進行更深入的考察。這次他們在北京的相會，標誌著二人禪宗史研究交流的一次高潮。

三、北平圖書館和東方文化事業部

在北京期間，鈴木兩次到北平圖書館訪問，目的是查找敦煌寫本禪宗資料。北平圖書館位於今北京市內文津街7號、北海公園西側，新中國後改為北京圖書館，1998年後改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照片資料中有一張鈴木等人在北平圖書館門前的合影，編號1889，前排左起為鈴木、諛巴雷特夫人、楊維新，後排左起為阮鑒光（鈴木一行的隨行翻譯）、高阜，照片下有題記：「北平圖書館 諛巴雷特夫人，楊維新先生 6.11」。可見當時鈴木與諛巴雷特夫人、高阜、阮鑒光等一起訪問了北平圖書館，而接待他們的是楊維新。關於諛巴雷特夫人的情況目前不詳，鈴木後來在《支那佛教印象記》的「寫真細說」裡提到：「在北平逗留期間，諛巴雷特夫人（曾到京都南禪寺訪問）與我們同行」¹⁰。南禪寺位於日本京都市內，是日本臨濟宗南禪寺派大本山。諛巴雷特夫人此前曾訪問過日本京都的南禪寺，也許那時已和鈴木相識。兩天後，即

¹⁰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26，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頁161。

6月13日，這位西洋女士又陪同鈴木一行訪問了北平的觀音寺和龍泉寺，大概她對東方的佛教頗有興趣。照片資料中沒有鈴木一行當天在其他地方的留影，很可能他們在北平圖書館逗留了較長時間。

在緊張的訪問日程中，鈴木兩次造訪北平圖書館，並與錢稻孫、楊維新等北京圖書館人員接觸，顯然是為了查找資料。事實上鈴木到北平圖書館是有備而來，他在訪問之前曾參考陳垣的《敦煌劫餘錄》，但是還不足以判明這些資料的詳細情況，因而利用此次機會，到北平圖書館作進一步調查¹¹。結果不虛此行，他不僅找到了若干事先期待的資料，而且後來還把它們整理出版，即1936年出版的《敦煌出土少室逸書》和《校勘少室逸書及解說》，其中主要是達摩和南宗的資料。通過在北京的資料調查，鈴木的敦煌禪籍研究更上層樓。

除了胡適以外，鈴木還有一次和多位中國學者的聚會，時間是在6月13日晚，地點在東方文化事業部，聚會的召集人是橋川時雄。

東方文化事業部，全稱「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原址位於北京市內東廠胡同，是日本政府設在北京的對華文化事業機構，因其背景為日本外務省的對華文化機關「文化事業部」，故又稱「東方文化事業部」。1926年成立，研究工作主要是《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編纂（其成果結集為《續修四庫全書提要》13卷，1971-1972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日戰爭結束後被中國政府接收，會址劃歸民國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中國成立後劃歸中國科學院。東方文化事業部本館建於1930年前後，2007年春被拆除。當年胡適的住宅就在附近，北京大學也相距不遠。照片資料中有一張鈴木等人在東方文化

¹¹ 參見鈴木大拙，《校勘少室逸書及解說》，安宅佛教文庫，1936年，頁1-71。

事業總委員會院內的留影。當鈴木來訪時，該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為橋川時雄。

橋川時雄（1894-1982）是日本福井縣人，著名漢學家。1918年赴北京，歷任共同通訊社、《新支那》報社、《順天時報》報社記者。1920年至九江訪問陶淵明遺跡。1928年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32-1945年任東方文化事業總務委員署理，為該機構實際負責人。1943年與周作人等在北京成立東方民俗研究會，任幹事長。在華期間還曾兼任北京多所大學教職。1946年回國，1948年任京都女子專門學校（京都女子大學前身）教授，1952-1957年任大阪市立大學教授，1957年獲文學博士稱號（關西大學），1958-1971年任二松學舍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曾翻譯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1923年）、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3年）、馮至的《杜甫傳》（1955年）等，著作有《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年），另外還有許多關於中國文史方面的論文¹²。

出席這次聚會的除橋川時雄和鈴木大拙以外，還有中國學者胡適、徐森玉、錢稻孫、湯用彤、胡鳴盛、楊維新，一共八人。

徐森玉（1881-1971），名鴻寶，著名文博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當時為東方文化事業部圖書館主任。徐氏又為佛教居士，曾作為中國佛教代表團成員出席「東亞佛教大會」，是韓清淨主持的法相研究會和三時學會的主要成員，1933年參與山西趙城藏的調查和《宋藏遺珍》的編輯。新中國後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上海佛教協會常務理事，「文革」

¹² 參見今村與志雄，〈橋川時雄年譜〉，《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7，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期間被抄家、批鬥，最後含冤而死¹³。

錢稻孫（1887-1966）是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教育家。出身書香世家，是著名學者錢玄同的侄子，父親是清朝外交官。早年隨父赴日本，中學畢業後又隨父親赴歐洲，先後在比利時和義大利留學。1910年回國，先在教育部任職，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兼任北平圖書館館長。1937年日軍佔領北平，錢氏受清華大學委託留校，後任日偽政權屬下的北京大學秘書長、校長。抗戰結束，以漢奸罪被捕入獄，後因病獲釋。新中國時期，先在山東齊魯大學教醫學，後調回北京，在衛生部出版社當編輯，1956年退休，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聘為特約翻譯。1966年8月被紅衛兵抄家、毒打，不久去世。1980年代平反，「漢奸」罪名被取消¹⁴。錢氏生前有許多譯作，如但丁的《神曲》、日本的《萬葉集》和《源氏物語》等。鈴木到訪時，錢氏為清華大學教授，又精通日本文化，因此鈴木到北京伊始就先行拜訪了他，此次是第二次會見。

湯用彤（1893-1964）是著名的佛教史和哲學史學者。曾在美國留學，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抗日戰爭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新中國時期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考古委員會委員、同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鈴木到訪時，湯氏為北京大學教授。

胡鳴盛（1886-1971）是著名的文史學者。曾在北大國學研究所、北京醫科專門學校任教，參與整理明清檔案，後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

¹³ 參見〈第二任館長徐森玉〉，中央文史研究館網（<http://www.crich.org.cn>，2011年4月22日下載）。又參見〈徐森玉和「南歐北韓」〉，網易新聞網（<http://news.163.com>，2011年4月22日下載）。

¹⁴ 參見文潔若，〈我所知道的錢稻孫〉，北京文藝網（<http://www.artsbj.com>，2010年5月16日下載）。

會委員兼寫經組組長，主持編寫敦煌寫本目錄。1935年以後歷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故宮博物院特詢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期間返回故鄉，新中國期間曾任湖北應城縣副縣長¹⁵。鈴木來訪時，胡氏正在北平圖書館任職，而且是敦煌寫本編目的負責人。

楊維新的情況不詳，目前僅知他在1930年代為北平圖書館編纂部館員，或說為該館日本部主任，通日文，有論文《中國印刷起源》，譯文有〈新羅真興王「巡狩管境」碑考〉（今西龍著）、〈高麗朝大藏經考〉（池內宏著）等，曾參與梁啟超藏書的編目（1933年完成，書名《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2005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僅從這些情況也可看出他是一位博學的學者。

由此可見，當時參加聚會的中國學者，或在圖書館任職，或熟悉敦煌文獻，或是佛教學者，或精通日本文化，特別是當時由徐森玉、胡鳴盛、楊維新等人編寫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已接近完成¹⁶，他們對於鈴木瞭解中國的佛教以及調查敦煌文獻，都可以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因此這次聚會顯然和鈴木的調查目的有關。

關於這次聚會，胡適在當天的日記裡有如下記載：

橋川時雄宴請鈴木大拙，約錢稻孫、湯錫予、徐森玉與我作陪。

橋川送我一部常盤大定的《寶林傳之研究》，附有日本出現的《寶

¹⁵ 參見〈胡鳴盛〉，百度百科網（<http://baike.baidu.com>，2010年4月19日下載）。

¹⁶ 《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由徐鴻寶、胡鳴盛、周叔迦等編寫，於1929年開始編著，著錄敦煌寫本共8679件8738號，並附有簡略提要 and 考訂說明等，至1935年完成初稿。因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南遷，書稿一直沉沒，未能定稿出版，至1990年重新發現，今存北京圖書館善本部。

林傳》第六卷影本。攜歸讀之。¹⁷

可見這次聚會是為了招待鈴木大拙，同時邀請胡適等中國學者作陪，當時橋川把常盤大定的《寶林傳之研究》送給了胡適¹⁸。《寶林傳》成書於唐代貞元十七年（801），是目前所知最早按照西天二十八代的祖統說編寫的禪宗傳燈史。此書原有十卷，流傳下來的只有殘本。1932年，常盤大定發現了京都青蓮院收藏的《寶林傳》第六卷寫本，次年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東方學報》第四期，然後又將此成果與《寶林傳》第六卷寫本的影印件合為一書，題名《寶林傳之研究》，於1934年3月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出版。胡適一向關注禪宗祖統說的形成經過，而此書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具有參考價值，橋川是胡適的好友，大概瞭解他的研究興趣，於是把這個剛剛出版的本子送給了胡適。

順便一說，1933年山西《趙城藏》發現之後，徐森玉前往調查，從中選出四十六種孤本編輯為《宋藏遺珍》，於1935年在上海出版。在《宋藏遺珍》中就有《寶林傳》的第一至五卷和第八卷，並補進常盤大定發現的第六卷，後來常盤也將《趙城藏》本的《寶林傳》殘卷與他自己發現的第六卷合成七卷本¹⁹，正是由於中日兩國學者的努力與交流，才使《寶林傳》的大致面貌得以再現。胡適當晚將常盤的新著「攜歸讀之」，後來也對《寶林傳》作過研究，在他晚年的〈跋寶林傳殘本七卷〉一文中，也有對常盤此書的參考。而常盤當初在對《寶林傳》第六卷寫本進行研究時，為了與古本《壇經》相對照，曾向鈴木借閱興聖

¹⁷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6，頁397。

¹⁸ 常盤大定（1870-1945），日本近代著名佛教學者。

¹⁹ 常盤大定的合成本收在他的《統支那佛教史の研究》（1941年春秋社松柏堂出版，1974年名著普及會再版改名為《支那仏教史の研究二》）。後來胡適、柳田聖山、田中良昭等人都曾對《寶林傳》進行過研究或整理，但該書之第七、九、十卷至今闕如。

寺本《壇經》的資料²⁰。總之，在《寶林傳》一書的發現、整理和研究過程中，不僅凝聚了中日兩國學者的心血，而且還穿插著他們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的佳話。



■ 東方文化事業部晚宴合影



■ 東方文化事業部的最後身影
(2007年4月8日)

關於這次聚會，當時留下照片一幅，畫面是鈴木等八人的合影。照片原物至今保存在松岡文庫，照片襯紙的上方有鈴木手寫的人名，從右往左依次為：胡鳴盛、楊、稻孫、橋川、self（自己）、胡適、徐鴻寶、湯用彤，襯紙的下方印有「北京山本寫真館」的字樣。鈴木坐在中間，胡適等六位中國學者分坐兩側，橋川站在鈴木身旁。又從「北京山本寫真館」的字樣可以得知，這張照片是由北京的山本寫真館拍攝製作的。鈴木回國以後，把這張照片放大沖洗，嵌入精美的相框，可見他對這次聚會的重視。

鈴木在《支那佛教印象記》裡也收錄了這幅照片，並在照片下面附有說明：

²⁰ 參見常盤大定，《寶林傳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年，頁2、74-75。

東方文化事業部的招待宴 北平 於東方文化事業部（6.13）右起胡鳴盛先生（北平圖書館）、楊維新先生（同）、錢稻孫先生（清華大學教授）、橋川時雄先生（文化事業部主事）、鈴木大拙、胡適先生（北京大學教授）、徐鴻寶先生（東方文化圖書館主任）、湯用彤先生（北京大學教授）²¹

根據這個題記，可以確認宴會參加者當時的身份，並可斷定宴會的地點就在東方文化事業部。

1980年，橋川時雄在接受採訪時也曾談到這次聚會：

胡適去南方是在什麼時候呢？佛教學的鈴木大拙到我這裡來過，大概就是在那之後不久吧。大拙的著述裡就有當時的旅行記（《支那佛教印象記》，昭和九年十月刊）。鈴木在美國好像和胡適很親近，所以鈴木先生來了以後馬上就說「想見胡適」。於是我就打電話，一起吃了晚飯。結果胡適高高興興地來了，順便還把研究佛教史和各種專業的同伴帶來了。大家圍著桌子，東拉西扯地聊到夜裡很晚，兩個人都很高興。胡適說「一定要給咱們拍張照」，所以夜裡很晚還把寫真館的叫來……。當時的照片就在鈴木的著作裡。我記得胡適離開北京是在那之後不久的事情。²²

這裡所說的「胡適去南方」，是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離開北平；「一起吃了晚飯」就是指1934年6月13日晚的聚會。從橋川的回憶來看，大概當天下午鈴木就到了東方文化事業部，他提出要見胡適，於是橋川打電話邀請胡適參加，而胡適又把其他幾位中國學者叫來一同

²¹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26，頁96。

²² 今村與志雄，《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頁360。

作陪，宴會上大家海闊天空地神聊，都很開心，最後胡適提議合影留念，於是把山本寫真館的人叫來拍攝了這張照片。可見當時聚會的氣氛歡快而融洽。

不過橋川的記憶也有不準確的地方，他似乎把鈴木與胡適在美國的接觸記成了這次聚會之前的事情。實際上鈴木與胡適在此之前還不會在美國相遇，他們在美國的交往發生在十幾年之後，那是 1950 年代的事情了。另外，在橋川時雄的訪談回憶錄裡也收錄了這張合影，照片下附有說明：

胡適的招待宴（1934 年）左起尚秉和、徐鴻寶、胡適、鈴木大拙、橋川時雄、錢稻孫。²³

這個題記把照片裡左起第一人說成尚秉和²⁴，沒有提到湯用彤、楊維新、胡鳴盛三人，這一點與胡適和鈴木大拙的記述不同。筆者於 2008 年 12 月 25 日訪問了湯用彤之子湯一介先生。據湯一介先生說，1934 年時他只有 7 歲，如今對父親當時的形象已經記憶不清，不過照片中這個人物與父親的相貌特徵比較相合，可以肯定就是湯用彤先生。

順帶一提，上面提到的山本寫真館，就是日本近代攝影家山本贊七郎在北京開設的照相館。山本贊七郎（1855-1943），日本岡山縣人，1882 年在東京開設寫真館，1897 年遷往北京，在霞公府（今王府井貴賓樓飯店北側）一帶開設山本寫真館。山本在中國拍攝了北京風景、清代人物、市民生活的大量照片，還有《北京名勝》（1906 年）寫真集

²³ 同上書，頁 289。

²⁴ 尚秉和（1870-1950），中國近代著名學者，尤長於《周易》研究，兼通古文、中醫、金石、繪畫、中國社會風俗史等。

出版，留下許多有關晚清民國期間的珍貴歷史資料，近年頗受矚目²⁵。鈴木與胡適等人在東方文化事業部的這張合影，無疑也是山本寫真館的又一項重要史料。

四、鈴木看到的北平佛教

6月10日，鈴木一行訪問了雍和宮。雍和宮猶在，位於北京舊城區內東北角、今雍和宮大街路東，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寺。鈴木一行來此訪問，拍攝了十二幅照片。鈴木在《支那佛教印象記》的「寫真細說」裡說：

雍和宮門前北平，安定門內（六月十日）

雍和宮年輕的喇嘛僧們（六月十日）

去白雲觀之後，下午半天在雍和宮，把寺內通通看了。特別是傍晚，聽到年輕喇嘛僧的讀經，加上大喇叭和鼓聲，更有一種神秘的莊嚴氣氛。²⁶



■ 雍和宮客堂前合影



■ 雍和宮的喇嘛

²⁵ 關於山本贊七郎和他的寫真，可參見〈日本攝影師的北京寫真〉，新浪博客（<http://www.weibo.com>，2015年4月17日下載）。另外還可參見遊佐徹，〈近代中国の写真文化と山本讚七郎〉，《岡山大学文学部プロジェクト研究報告書》，岡山大学文学部印制，2013年3月。

²⁶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26，頁161。

當時的照片中有兩張與喇嘛的合影，一張攝於雍和宮門前廣場，一張攝於客堂門前，一起合影的喇嘛都是蒙古人；另外，還有一張照的是三個蒙古小孩。由此看來，當時雍和宮裡的喇嘛主要是蒙古人。另有一張照的是喇嘛們列隊步入大殿的場面，他們多很年輕，有的看上去還是孩子，大概因為感到新鮮，不禁轉過臉來對著相機方向窺視。鈴木一行對雍和宮裡所看到的也同樣感到新鮮，所以他們除了拍攝建築物之外，還拍攝了一位留著長鬍子的羅漢僧、以及前來參訪的遊客，而對於喇嘛的裝束，似乎對他們頭上戴的高帽子特別感興趣，因此他們特意拍攝的喇嘛差不多都戴著又高又大的帽子。蒙藏佛教原為一體，通過鈴木在雍和宮看到的場景，可知這種傳統在當時的雍和宮裡還在延續。



■ 西直門外育幼院

照片資料中有一張鈴木等人在一家育幼院門前的留影，照片下有題記：「育幼院 西直門外。」可知該育幼院位於北京西直門外一帶，可惜現在已無法確認它的具體位址。

從照片看去，這家育幼院的門庭比較高大，不難想見，該座院落應比一般的四合院規格更高。關於該育幼院的情況，鈴木沒有留下說明。不過，他在《支那佛教印象記》裡談到此次訪問中看到的佛教福祉事業，其中提到了韓清淨：

在社會事業方面，好像沒什麼特別顯著之處，但是設立了孤兒院的地方，在南京、北京、杭州都有，醫院也在北京三時學會的清淨居士的努力下建立起來。這是頗為現代化的醫院，雖然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按照這位居士的計畫，看上去像是相當齊備的醫院，相信數年之後一定能作好出色的慈善性經營的準備。²⁷

這裡提到的「社會事業」就是指佛教的社會慈善事業，「清淨居士」就是指韓清淨。其中提到的那所醫院，剛好成立於1934年6月，名為「大良醫院」²⁸。從鈴木的記述來看，他在北京瞭解到韓清淨所主持的佛教慈善事業，而這家育幼院或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關於韓清淨和三時學會，一般只注意他們的佛典講習和研究事業。通過鈴木的記述，得以知道他們在從事佛教學術研究之外，還曾積極開展佛教慈善事業的一部分事實。不過遺憾的是，鈴木到訪過的育幼院以及韓清淨創辦醫院的具體情況，今已不知其詳。

韓清淨（1884-1949），原名克定，又名德清，河北河間人，中國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和佛教學者。出身書香世家，18歲中舉，後傾心佛教，1921年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會，後在雲居山閉關，潛心研究佛典。1925年赴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1927年成立三時學會，任會長，會員多為著名學者和學僧，如葉恭綽、梅光羲、朱芾煌、徐森玉、周叔迦、趙樸初、巨贊、周紹良、石鳴珂（芝峰）等，主要從事法相唯識學的講習、研究、譯述、出版，又曾參與《宋藏遺珍》中唯識類經典的調查和整理，並開展佛教慈善事業。韓氏本人尤長於法相唯識學的研究，有唯識類著述多種，時人將他與南京的歐陽竟無並稱為「南歐

²⁷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26，頁112-113。

²⁸ 參見塵空，《民國佛教年記》，巴蜀網（<http://www.phoer.net>，2011年4月22日下載）。

北韓」。三時學會舊址位於今北京市內北長街 27 號，1956 年停止活動，現在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在地。

五、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在北京期間，鈴木一行還訪問了觀音寺和龍泉寺。當時在觀音寺拍攝了照片三幅。一幅編號 1885，是鈴木等七人在觀音寺某殿門前的合影，前排為覺先大和尚和兩位中國僧人，後排為鈴木、諛巴雷特夫人、高島、齋藤貞一。另一幅編號 1886，是鈴木等六人在同一位置的合影，前排是覺先和另外兩位中國僧人，後排為鈴木、諛巴雷特夫人、高島，照片下有題記：「覺先大和尚 觀音寺 6.13」。第三幅是大約十名中國兒童和高島的合影，他們站在觀音寺內某正殿與偏殿之間，照片下題記為「孤兒院 觀音寺」。根據這些照片，可知當時到觀音寺訪問的有鈴木、諛巴雷特夫人、高島、齋藤貞一，接待他們的是覺先大和尚等人；另外還可以知道當時覺先應住此寺，寺內辦有孤兒院，至少收養了十名以上的兒童。



■ 觀音寺，鈴木和覺先大和尚



■ 觀音寺的孤兒

關於這座觀音寺，鈴木沒有更多說明，那麼它究竟在哪裡呢？據統計，北京歷史上有許多大小不等的觀音寺廟，或稱「觀音寺」，或稱「觀

音院」、「觀音庵」、「觀音堂」、「觀音廟」等等，其中僅「觀音寺」就有五十三座，包括原城區十九座，郊區的三十四座²⁹。在這麼多的觀音寺中，要確定鈴木訪問的是哪一處，還要從覺先大和尚說起。

覺先是當時北平最有影響的僧人，但筆者尚未見到有關他的詳細資料。根據釋東初的《中國佛教近代史》、水野梅曉的《日本佛教徒訪華要錄》，以及清末時期《東方雜誌》的記事，覺先俗姓鄭，湖北襄陽（或說宜城）人，少年出家，光緒皇帝御賜「覺上先人」法號，為京師大和尚。曾赴日本遊歷多年，有感於「我國佛教之衰，皆由僧人無學」，回國後仿照日本佛教的作法，申請「於京師設立中國佛教總公所，推諸各省，由各寺住持公選有德僧人與辦學校事務，……並設立貧民工藝院」³⁰，亦即依靠寺院的力量創辦學校，振興教育，造福地方。大約在民國元年前後雙目失明。民國初期，為維護廟產而帶頭反對內務部的《管理寺廟條例》。曾任北平佛教會會長、北平佛教平民教育聯合會主席。1929年9月，率北平佛教界約兩千人請願，抗議北平電車公司人員霸佔鐵山寺，勇敢抵制當時的反宗教運動，終將寺院收回。曾奔走南北各地，呼籲佛教革新，提倡佛教現代化，並創辦學校和孤兒院，當時龍泉寺內的孤兒院就是他所創辦³¹。總之，覺先一方面反對佛教保守勢力，積極從事佛教革新運動，創辦學校，救濟孤兒，被稱為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先驅者」，另一方面為維護佛教的合法權益而勇敢抗爭，因此贏得人們的尊敬。1920-1930年代，到北平來訪的日本僧人大多拜

²⁹ 參見王同禎，〈北京寺廟一覽〉，《寺廟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³⁰ 不著撰者，〈各省教務匯志〉，《東方雜誌》7，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頁45-46。

³¹ 參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冊下，臺北：東初出版社，1989年，頁828-830。又參見水野梅曉，《日本佛教徒訪華要錄》，東京：日本佛教聯合會，1928年，頁43-44。

會過他，由此也可看出他當時在北平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

根據一些零散的記載，可知覺先住在當時象坊橋或國會街的觀音寺。據《北京廟宇征存錄》：「觀音寺在國會街四十六號，僧覺先，碑一，龍泉寺下院」³²；又據王同禎的〈北京寺廟一覽〉，此觀音寺在「西城國會街西順城街」，建於明代³³。可見這座觀音寺位於國會街，當時為龍泉寺下院，覺先任住持。明代曾在這一帶設有象坊，附近有橋，所以舊稱「象坊橋」；民國初期為國會所在地，所以又稱「國會街」。如今象坊橋和觀音寺都已消失，極少有人知道這個地名和寺院，其原址位於北京宣武門內西側，即今宣武門西大街北側新華社一帶。就目前所知，1910年著名僧人道階曾在這裡組建佛學研究會³⁴；1919年4月，覺先在這裡設宴歡迎從日本歸國的讚揚喇嘛，當時「朝野名流商組中華佛教統一會」³⁵；1920年，覺先在這裡發行《覺世日報》，後來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³⁶；又據倓虛的回憶，覺先原為該寺住持，大約在1921年由其弟子范成接任，寺內設有佛教籌賑會³⁷；上文提到的由覺先發起的維護廟產、收復鐵山寺的遊行請願活動，也是從這裡集合出發的。另外，畫家齊白石也曾在此駐留。這座觀音寺雖然規模不大，但在近代史上曾相當活躍，當1920年代前後，是北京佛教的重要據點。鈴木一行訪問的觀音寺就在這裡。當時龍泉寺辦有孤兒院，觀音寺作為龍泉寺的下院也有

³² 張江裁，《北京廟宇征存錄》，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2，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7。

³³ 參見王同禎，《寺廟北京》，頁217。

³⁴ 參見《金錢寺》，百度百科網(<http://baike.baidu.com>，2011年5月24日下載)。

³⁵ 塵空，〈民國佛教年紀〉，巴蜀網(<http://www.phoer.net>，2011年5月24日下載)。

³⁶ 參見〈范古農居士〉，互動百科網(<http://www.hudong.com>，2011年5月24日下載)。

³⁷ 參見倓虛口述，《影塵回憶錄》，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93年，頁170。

孤兒收養，所以當鈴木來訪時，再次看到當時佛教慈善事業的實況。

鈴木後來在《支那佛教印象記》的「寫真細說」裡對覺先大和尚作了如下記述：

覺先和尚是失明的知識高德之人。五月二十日我們一行在世尊誕生日、在阿育王寺看到過燃指供養，他年輕時剛好在這一天也在那個寺院做過燃指供養，左手的無名指從根上沒有了。³⁸

根據鈴木的記述，可知覺先早年曾在阿育王寺，當時因燃指供養而將左手無名指燒掉。鈴木稱其為「知識高德之人」，足見對覺先的學識和人品深懷敬意。當鈴木到訪時，覺先已不擔任該寺的住持，但是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鈴木一行在龍泉寺留下兩幅照片，一幅編號 1884，是鈴木與諛巴雷特夫人、高島及一位中國僧人的合影，照片下有題記：「龍泉寺大雄寶殿前」，由此可知合影的地點在龍泉寺大雄寶殿前。另一幅照的是寺院山門前的影壁，照片下的題記為「龍泉寺門前 6.12」。



■ 龍泉寺大雄寶殿前

³⁸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 26，頁 161。

在鈴木留下的資料中，沒有顯示這個龍泉寺是在哪裡。說到北京的龍泉寺，現在一般只知道海淀區西山的龍泉寺，但從鈴木當天的行程來看，他們顯然沒有時間遠赴郊外，因此他們訪問的龍泉寺應在市內。據統計，北京歷史上的龍泉寺共有十四處，其中城區二處，分別位於今西城區和宣武區境內³⁹。如果鈴木訪問的龍泉寺在城內，那麼可能是哪一處呢？從照片資料來看，可知當時寺內有僧人在住，也就是說這座龍泉寺當時還是一處有宗教活動的道場。又據網路資料介紹，民國時期還有宗教活動的龍泉寺就是南城的那一座。該寺舊址位於今陶然亭公園西側龍泉寺胡同與龍爪槐胡同之間，據說始建於宋代，經過歷代修繕，形成較大規模，共有殿宇、僧舍二百四十五間，清光緒十六年（1890），印光大師自紅螺寺移住於此，民國期間，畫家張大千曾在此作畫，齊白石早年也曾在此駐留⁴⁰。據《日下舊聞考》記載，這座龍泉寺原為古刹，明正統八年（1443）由北京大興隆寺萬松和尚重建，後於成化年間和清康熙年間經過重修，明清時期為十方禪院，乃「幽人禪客之居」，「其為緇流掛錫之地舊矣」⁴¹。據民國時期《北平廟宇通檢》，該寺位於「右安門內龍泉寺三號……系古刹。明初圯廢，成化年間重建。清康熙己丑重修，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嘉慶十六年又重修」⁴²。實際上，清末民國時期，覺先大和尚就住在這裡，這座寺院在當時的北京頗為知名。在

³⁹ 參見王同禎，《寺廟北京》之〈北京寺廟一覽〉。

⁴⁰ 參見野僧，〈北京的佛教寺廟（13）——宣武龍泉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2011年4月25日下載）。又參見李翔，〈北京主要名人故居及北京的胡同〉，豆瓣網（<http://www.douban.com>，2011年4月25日下載）。

⁴¹ 參見清·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冊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001。

⁴² 許道齡，《北平寺宇通檢》，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1，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185-186。

1905年第3期的《東方雜誌》裡曾提到「南下窪龍泉寺僧覺先」，其中的「南下窪」，就是指現在的陶然亭公園一帶，由於這裡地勢低窪，積水成池，所以當初俗稱「南下窪子」。1926年10月，日本佛教訪華團到這裡參觀寺內的孤兒院，受到覺先大和尚的接待⁴³；1935年，藤井靜宣提到北平龍泉寺的住持經營孤兒院已有三十年⁴⁴。又張江裁的《北京廟宇征存錄》專門著錄當時北京市內尚存的各類寺廟，其中提到：「陶然亭在右安門內龍泉寺東南」，「龍泉寺在右安門內，僧明靜」⁴⁵。張書完成於1943年，當時龍泉寺僧雖已換作明靜，但國會街或象坊橋的觀音寺仍是龍泉寺的下院，可見兩寺的關係直到1940年代還有保持，而這種關係大概就是由覺先大和尚奠定的。總的來說，龍泉寺不僅歷史悠久，規模較大，而且當時覺先大和尚在此住持，並辦有學校和孤兒院，可以說是當時佛教革新運動在北方地區的大本營，在佛教界及文人墨客之間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成為鈴木一行的訪問對象。另外，該寺與上述觀音寺相距不太遠，而且兩寺都與覺先大和尚有關，因此可以斷定，鈴木當初訪問的就是陶然亭附近的龍泉寺。

2011年5月和2013年8月，筆者兩次尋訪龍泉寺舊跡。該寺早已不存，原址被瓜分為東西二部。東部屬龍泉寺胡同5號，今為陶然亭小學，西部屬龍爪槐2號，先為居民院落，今為某機關用地，兩處尚有龍泉寺遺構。據鑲嵌在陶然亭小學院內牆壁上的〈陶然亭小學記〉，該小學的前身為龍泉學堂，而龍泉學堂始建於清末，位於龍泉寺內，後來道

⁴³ 參見水野梅曉，《日本佛教徒訪華要錄》，頁43-44。

⁴⁴ 參見藤井草宣，〈現下の支那仏教情勢〉，載《南瀛佛教》13-10，台灣佛教史料庫。（<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2011年6月17日下載）。

⁴⁵ 張江裁，《北京廟宇征存錄》，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2，頁38。

興和尚將龍泉學堂改為龍泉孤兒院，新中國成立後，百川和尚又改為私立龍泉寺小學，1956年由政府接管。近代史上，龔自珍、魯迅、齊白石等人曾經到此。順便一提，關於這座龍泉寺的位址，有的資料以為與清末名臣張之洞的抱冰堂（今為張之洞紀念館）同在一處⁴⁶。實際上抱冰堂的原址為龍樹寺，該寺距龍泉寺不遠，但二者並非一事⁴⁷。

六、結語

此次訪華，對於鈴木來說是一次重要的經歷。鈴木雖然有著深厚的漢學修養、熟知中國的歷史文化，對於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典籍更是瞭如指掌，但是對中國佛教及中國文化的實地考察還是第一次，通過直接的耳聞目見，使他對中國佛教以及中國文化有了新的或更深入的瞭解。首先，他通過與晚清佛教的衰落狀況相對照，看到了當時中國佛教復興的景象，又與日本的佛教相對照，發現了中國佛教的長處。在此基礎上，進而確信中日佛教合作的必要，並希望通過這種合作共同克服西方文明的弊端。其次，通過實地觀察，加深了對中國佛教特質的認識，進一步確信中國佛教具有現實性、世俗性的傾向。再次，他通過對道教、喇嘛教等的考察，對佛教以外的中國宗教文化也獲得新的瞭解。最後，通過對中國保存的敦煌寫本禪宗文獻的調查，為他以後在這一領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礎。就他在北京期間的收穫來說，他所看到的佛教慈善事業，屬於上述第一項；他對白雲觀和雍和宮的訪問，屬於上述第三項；他在北平圖書館的資料調查，屬於上述第四項。這些收穫，在他後來有關中國佛教、禪宗等問題的著述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反映。

⁴⁶ 參見王同禎，《寺廟北京》，頁258。又參見〈京都覽勝——北京內八剎〉，517戶外網。（<http://www.517huwai.com>，2011年4月25日下載）。

⁴⁷ 參見〈北京的張之洞紀念館：抱冰堂〉，京華論壇網（<http://bbs.qianlong.com>，2011年4月25日下載）。

然而遺憾的是，鈴木生前與中國的關係、他的訪華經歷以及當時令他感動的一幕幕場景，大多已被遺忘殆盡，許多相關的事項已經無人知曉。例如，關於鈴木與胡適的禪學研究，已有不少論述，然而關於他們交往的具體經過，至今語焉不詳。鈴木曾經訪問的北京南城龍泉寺，舊址就在筆者的故鄉，筆者少時常從那裡經過，但是從來不知那些舊屋原來是座寺院，甚至連「龍泉寺」的名字也不會聽說。在那個年代，沒有人關心這些，我們也無從知道那裡的故事。幾十年後，筆者旅居海外，根據外國人留下的資料，才得以知道少時看到的那些舊屋原來就是龍泉寺，那裡曾經有過如此人物、如此故事、如此輝煌！於是為尋舊跡，故地重遊，然而卻被拒之門外。遭此尷尬，不禁想起清代史學家王鳴盛的往事。他當年訪得〈海雲碑〉，發現碑的下半埋入土中，欲發土讀之，卻遭到當地居民禁止，於是那些被掩埋的碑文也就繼續埋沒，久久不得重見天日。三百年後的今天，自私、冷漠、無視古物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倒是人心依舊！再說一代高僧覺先大和尚，當年北京佛教界的領袖，如今還有誰人記得？覺先住過的觀音寺，早已煙消雲散，蹤跡全無；當年的莊嚴道場龍泉寺，早已文物流失，遺構改作他用，昔日的往事還有幾人關心？其實類似的情況多不勝數，既不限於北京，更不限於這兩座寺院。國人動輒以歷史悠久、古老文明而誇耀自詡，但數典忘祖、毀壞文物的也是國人，無論是對傳統、對歷史，還是對文物、對古跡，最多只是實用而已，缺少虔誠的敬意。遠的姑且不說，鈴木的訪華距今不過八十年，然而歷經世事滄桑，文獻不足徵，舊跡已難尋，怎不令人歎歎？萬幸的是，鈴木留下了許多當時的照片，還有兩部長篇訪華印象記，其中不僅記述了他們訪華過程的某些細節，同時也保存了中國近代佛教的一部分舊影。由於我們自己對歷史不夠珍惜，沒有保留當年的記憶，於是只能參照外國人的記錄恢復相關的記憶。數典忘祖之後，只好禮失求

諸野，鈴木當初作為訪客留下的記錄，如今卻成了我們瞭解中國近代佛教的珍貴史料。歷史的變遷、命運的捉弄，使鈴木一行的中國佛教之旅又多出了一重歷史記錄的意義，這恐怕是他們當初不曾預想到的吧。



引用書目

- 于敏中等編，1981，《日下舊聞考》冊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王同禎，2009，《寺廟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
- 今村與志雄，2006，《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東京：汲古書院。
- 水野梅曉，1928，《日本佛教徒訪華要錄》，東京：日本佛教聯合會。
- 不著撰者，1905，《東方雜誌》3、7，上海：商務印書館。
- 胡適，1982，《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
- 曹伯言整理，2001，《胡適日記全編》冊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許道齡，2006，《北平寺宇通檢》，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1，揚州：廣陵書社。
- 張江裁，2006，《北京廟宇征存錄》，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2，揚州：廣陵書社。
- 常盤大定，1973，《宝林傳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年。
- 鈴木大拙，2001，《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26，東京：岩波書店。
- 鈴木大拙，2002，《鈴木大拙全集》增補新版卷33，東京：岩波書店。

